

· 学术视野 ·

恩格斯批判“青年派”的科学方法 及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启示^{*}

杨 军 杨卓然

[摘 要]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 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的批判, 是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引领青年思想的成功典范。在批判“青年派”的过程中, 恩格斯展示了科学的批判方法, 注重把握“青年派”理论错误的根源和实质, 结合实践分析“青年派”理论错误的危害, 并将理论批判与组织处理结合起来, 及时消除“青年派”造成的消极影响。恩格斯批判“青年派”的显著特点是把批判错误理论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批判过程中, 恩格斯强调唯物史观是方法而不是公式, 集中阐释并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 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德国党的斗争策略。恩格斯对“青年派”的批判对我们的启示是: 必须保持对党内外思想动态的政治敏锐性; 必须重视党管媒体, 控制舆论阵地; 在思想交锋中要坚持原则, 同时把握分寸、讲究策略。

[关键词] 恩格斯 “青年派” 德国社会民主党 意识形态

19世纪末,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由文学家和大学生组成的“青年派”, 在理论上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在实践中有导致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德国工人运动走入歧途的可能。恩格斯视“青年派”的理论和实践是一场“大学生骚动”。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保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纯洁性和团结, 1890年7月至1892年10月间, 恩格斯在党的刊物上公开批判“青年派”的理论主张, 并在与康拉德·施米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保尔·拉法格、左尔格等人的书信中深入讨论“青年派”问题, 展示出应对“大学生骚动”的多种方法。恩格斯对“青年派”的批判, 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恩格斯批判德国“青年派”的主要方法

1890年, 随着德国社会民主党^①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 实施了12年之久的《镇压

^{*} 本文系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政课建设项目: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武汉大学)”(21SZJS42010486)的阶段性成果。

^① 这一时期其正式名称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69年-1875年其名称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75年-1890年其名称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10月其在哈雷大会上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为行文方便, 统称为“德国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以下简称“非常法”)到1890年9月30日正式期满,国内政治形势将更有利于工人运动的开展。在这个节点上,德国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共同组成了反对派“青年派”,他们在理论上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甚至利用无政府主义、拉萨尔主义来佐证自己的理论;在斗争策略上鼓吹工人的自发性,认为工会是唯一的革命组织,罢工是唯一的革命手段;在组织上反对民主集中制,要求赋予其主管党报更大的独立性,免于党组织的监督。在实践中,“青年派”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阵地,在党内开展派别活动,搞宗派主义,试图通过舆论活动和组织活动争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

面对党内党外出现的新情况,恩格斯以革命导师的自觉,高度重视党的团结统一和斗争策略,对“青年派”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由此呈现出以下科学方法。

(一) 注重把握“青年派”理论错误的根源和实质

“青年派”成员构成复杂、思想观点芜杂。从成员构成上看,“青年派”中既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党报编辑,也有一些青年工人和工会活动家。但他们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在活动之初没有明确的领袖、纲领,其派别属性通过报刊的相互声援展现出来,并在集会和党代会的辩论中得到强化。直到临近被开除出党,“青年派”才着手成立了一个带有讨论和教育协会性质的独立社会主义者联盟^①。梅林认为,“青年派”的核心人物是“能干”但“不善于言谈和著述”的工人反对派,而“几个年轻的作家”不过是“他们的发言人”^②。从思想背景看,“青年派”成员的工作涉及领域广泛,包括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等,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尽管他们常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在阶级斗争理论上与无政府主义接近,甚至利用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和“反动的一帮”等观点支撑自己的观点。对此,恩格斯从阶级根源和思想方法两个层次上分析“青年派”的理论错误。

恩格斯分析了“青年派”问题的阶级根源,阐明“青年派”问题成因在于大量理论水平不高的党员被部分党内知识分子鼓动,而这些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大学”的教育。

恩格斯分析“青年派”和德国工人之间的关系,说明为什么有一批工人群众支持“青年派”。在“非常法”实施时期,柏林等城市的工人在俾斯麦当局的残酷迫害下,积累了相当的激进情绪。从1888年开始,德国各行业的工人在许多大城市举行了大罢工等示威活动,革命形势一度高涨,推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规模迅速扩张。但是这些新党员缺乏斗争锻炼,整体理论水平不高。恩格斯指出“选举的胜利使群众,特别是不久前站到我们这边来的群众冲昏了头脑,他们以为现在用冲击就可以取得一切。”德国党中的新党员在理论上“没有达到老党员的水平……他们是一种很容易受反对你们的那些钻到前面去的文学家和大学生的影响和利用的材料。”^③然而,

^① 参见殷叙彝《一次大学生和文学家的骚乱——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期。

^② (德)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青载繁译,北京:三联书店,1966年,第3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78、441页。

“青年派”不可能给工人群众、新党员正确的引导。因为“青年派”的出现是“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作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的结果，他们不但“习惯性地把资产阶级大学当做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①，还因自己的出身而具有过分的优越感。

恩格斯还批判了“青年派”教条化、标签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做法。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给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②。在1890年9月发表的《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恩格斯揭露了“青年派”理论错误的主要特点：第一，宣称自己在维护唯物史观，但实际上却并不掌握唯物史观；第二，缺少对历史事实的研究；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作家所特有的无限优越感”。这些特点说明，“青年派”的思想方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理论不过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③。在《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一文中，恩格斯进一步就“青年派”的思想来源作出分析，指出恩斯特关于“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而完全自动地演进的”“人完全像棋子一样受经济关系（而它们本身就是人创造的！）的摆布”等观点，是“直截了当地重复他从形而上学者杜林那里学来的荒谬论断”^④。“青年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解读，实际上给资产阶级歪曲、攻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唯物主义”留下了把柄。

通过对阶级根源和思想方法的分析，恩格斯阐明了“青年派”理论错误的实质，既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德国党内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也反映出党内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掌握还很不充分，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

（二）结合实践分析“青年派”理论错误的危害

1890年2月2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意味着同年9月即将期满的“非常法”将无法再度延期。德国党即将重新取得合法地位，斗争形势发生变化。3月，“青年派”就发起了同德国党国会党团的斗争。“青年派”的席佩耳和巴京斯基通过报纸舆论造势，试图撇开党团来组织各地工人开展罢工。在党团干预并引导工人取消这一活动后，“青年派”的维勒和弥勒相继在《人民之声报》和《萨克森工人报》发表攻击文章，维尔纳则在柏林发起了反对议会斗争和“权威迷信”的集会。“青年派”的活动给德国工人运动制造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

恩格斯结合实践，及时揭露、分析和批判“青年派”理论错误的危害。恩格斯重点批判了“青年派”的机会主义斗争路线。即便“非常法”废除在即，德国反动当局并没有放弃打压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的意图，正在寻找借口挑起政府与工人之间的冲突。但“青年派”掌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02页。

的报纸却纷纷号召德国工人在五一节举行总罢工，这无疑会使德国党和工人运动面临新的危险。恩格斯在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表示，德国与法国的情形不同，“在德国，过五一我们要尽可能保持镇静”，还要小心当局通过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来挑起“乱子”^①。后来，恩格斯公开批判“青年派”理论的潜在危害，认为他们“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置生死于不顾地‘拿下障碍物’”，“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毁灭掉”^②。

恩格斯还指出“青年派”对德国党民主集中制的破坏。“青年派”质疑德国党的权威，要求赋予其主管党报更大的独立性，免于党组织的监督。“青年派”利用报刊等舆论阵地进行宗派活动，大肆攻击党团的“腐化”，敌视党团的权威和党的纪律，宣称“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拥有多数”，甚至造谣称恩格斯也和他们一样反对“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试图左右党的政策。对此，恩格斯在《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一文中严厉地警告“如果这个集团结合成一个互助保险会之类的东西，并且动用一切有组织的宣传手段，以便把自己的成员安插到党报编辑的位置上并通过党的报刊来指挥党，那它就会更加危险。”^③

（三）把理论批判与组织处理结合起来

“青年派”是行动着的反对派。他们不但控制着柏林、马格德堡和德累斯顿的党报，还在群众集会和党代会上公开地同倍倍尔等党的领导人进行辩论。支持“青年派”的维尔特贝格尔甚至在柏林炮制了一份匿名的抗议传单，试图争取工人的支持^④。可以说，“青年派”的活动已经严重破坏了德国党的团结。面对这种情况，恩格斯特别注重把理论批判与组织处理结合起来。他一方面在理论上回应“青年派”，另一方面及时地指导德国党在组织上处理“青年派”，使理论批判成为组织处理的依据，而组织处理成为理论批判的现实转化。

恩格斯指导党采用正确的策略凝聚党内共识，恢复被“青年派”搞乱的秩序。针对“五一节”是否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恩格斯在给左尔格、劳拉·拉法格等人的信中指出要“尽可能保持镇静”“控制各种过激的行动”^⑤，推动德国党的议会党团在1890年4月13日发布《告德国男女工人书》，说明了不赞成在五一节罢工的理由，逐渐控制了局势。对于“青年派”控制的党内报刊，恩格斯指示德国党通过组织程序剥夺“青年派”的权力。从1890年8月10日起，德国党通过了一系列党内决议，逐步夺回“青年派”在德累斯顿、马格德堡和柏林的报纸阵地；德国党组织多场大型的工人集会，在集会上进行辩论，使工人们放弃对“青年派”的支持。

为了从根本上克服党被小资产阶级左右的危险，恩格斯要求德国党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按照民主原则对“青年派”进行处理，多次在书信中说明对“青年派”进行处理的必要性。1890年10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03页。

④ 参见（德）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青载繁译，北京：三联书店，1966年，第324-32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85、392页。

月12日到18日，德国党在哈雷召开代表大会。大会批评了“青年派”的观点，对其主要成员维尔纳作了警告，“青年派”基本被击败。1891年，“青年派”再度活跃，借福尔马尔“黄金国大厅演说”事件攻击党的领导。在1891年10月的爱尔福特大会上，“青年派”的几名主要成员声明退党另组反对党，因此被开除出党。“青年派”最终丧失了党内影响。

二、恩格斯批判“青年派”的显著特点

“青年派”的理论错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遭受的挑战。一方面，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甚嚣尘上，亟需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防止马克思主义遭到歪曲和庸俗化。另一方面，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斗争环境的变化，迫切地需要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制定新的斗争策略。在针对“青年派”的理论批判中，恩格斯坚持“破”“立”结合，把批判错误理论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重申唯物史观的运用原则，并进一步明确德国党的斗争策略，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在批判中强调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

“青年派”的许多成员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其中，麦·席佩尔因其早前的论现代贫困和现代人口过剩的著作，被梅林认为是“学会掌握唯物主义历史观”^①。保尔·恩斯特极力维护经济关系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也使人们认为他的观点符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②。但恩格斯看到，“唯物史观在年轻党员的作品中通常只不过是响亮的词藻”^③，德国党内对于唯物史观的认识存在很多偏差。于是他从“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征出发，阐发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正确态度。

恩格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判定标准的问题。恩格斯多次引述马克思生前就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对其理论的曲解而发出的评论。当时，马克思以“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来划清自己与被歪曲、误读的“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在1890年8月到9月之间，恩格斯在对“青年派”的批判中连续三次引述马克思的这一表述，足见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恩格斯明确指出，不能把唯物史观看作一种公式，而应当视作一种科学的方法，否则就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而“青年派”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④。恩格斯在保尔·恩斯特的来信中，发现恩斯特在尝试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时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即按德国的情况公式化地理解小市民阶层的特点，并将其照搬到挪威。于是，恩格斯在回信中批评了他的错误，指出“如果不把唯

①（德）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青载繁译，北京：三联书店，1966年，第219页。

② 参见杨金海、史清竹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7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13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6页。

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①

恩格斯还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文艺问题和经济问题，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作出示范。恩格斯在给恩斯特的回信中，就恩斯特关于挪威作家易卜生作品的观点进行了细致的辨析。恩格斯指出，挪威的历史条件中具有的自由主义宪法和近20年的文学繁荣，都是德国所不具备的。挪威的小市民阶层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而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则是“被打断和遏制的了的发展的产物”^②。恩格斯认为，易卜生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虽然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与德国相比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③。恩格斯还在与施米特的通信中，就“青年派”掌握的报纸《柏林人民论坛》上发表的《每个人的全部劳动产品归自己》中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讨论的不足之处，指明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不能把“社会主义社会”理解为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现在应当“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趋向”^④。通过这些分析，恩格斯展现了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唯物史观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二）在批判中丰富发展唯物史观

“青年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促使恩格斯进行理论自省，他指出，青年们过分看重经济这一因素，他和马克思应当承担一定责任。因为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出于同论敌论战的需要，他们对历史发展中其他因素的强调不足，导致了误读。在批判“青年派”的过程中，恩格斯将此前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反杜林论》等原著文本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最为详尽的阐述”^⑤，以更加集中和精辟的方式进行阐明，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

恩格斯突出强调了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关系。恩格斯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回信中阐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⑥但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如宪法，各种法权形式，政治的、法律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也决定着历史斗争的进程，不能把经济因素看作唯一的决定因素。他提出了“历史合力”论，指明历史的最终结果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在经济的因素外，人的意志和人的活动也在历史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890年10月哈雷大会后，康·施米特给恩格斯写信，一方面请教唯物史观问题，另一方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0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4页。

为“青年派”的活动及其成员恩斯特·维勒辩护。恩格斯在回信中进一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说明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起的能动作用。他指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存在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政治权力的运动，“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①。

恩格斯还说明了唯物史观的运用原则，即在开展深入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运用。恩格斯认为，“青年派”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不懂得利用唯物史观指导自身的研究，不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而只顾构造理论体系。他进一步说明了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②

（三）在批判中明确德国党的斗争策略

针对“青年派”给德国工人运动带来的干扰，恩格斯立足于“非常法”废除后的斗争形势，特别是德国党重视议会斗争的情况，着重分析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关系，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革命策略的一些新观点，并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发。

首先，恩格斯认为德国党应当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有机统一起来，要学习利用合法斗争这一新的武器。针对“青年派”成员汉斯·弥勒所说的“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革命的，从来都不是反动的”，恩格斯批判道“如果没有必须加以反对的反动的暴力，也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暴力；要知道，对那些根本无须推翻的东西是不能进行革命的。”^③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恩格斯指出，当政府当局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时，德国党就要利用“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争得的合法手段”^④，这时候合法斗争能获得最大的成果。如果当局又采取了“非常法”之类的措施，德国党就必须重新走上它还剩下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合法的道路”。同时，恩格斯关注到了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因而特别告诫，即使采取非法斗争的手段，也不能在面对军队的情况下轻率暴动，否则就正中敌人的下怀。

其次，恩格斯结合德国党的实际，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应当坚持的原则。恩格斯提出，党的规模扩大时期，要特别重视党员的阶级立场和培养教育。“青年派”的文化水平较高，受过“学院式教育”，但并不能因此认定他们更有资格在党内取得官衔和职位。他指出“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9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5页。

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① 由于“青年派”攻击议会党团“腐化”“集权”，恩格斯多次提醒德国党的领导人改正自身的错误，要求他们不要脱离群众，避免给“青年派”以攻击的借口。恩格斯承认“在任何一个有议会代表的积极的政党里，党团是很重要的力量”，但反对在党的章程中过分强调党团的权威，不同意“规定党团处于绝对控制执行委员会的地位”“对执行委员会进行监督”，而认为“由具有决定权的独立委员会来处理申诉，也许会更好”^②。恩格斯反对“青年派”利用党报煽动混乱，同时也认为，党报不是党团的传声筒，党内应当有民主的气氛，利用党自身的力量来纠正错误。对于党内出现的“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恩格斯认为都不应当姑息和纵容，当“青年派”围绕福尔马尔问题抨击党时，恩格斯既批判了“青年派”的“左”倾错误，也批判了福尔马尔的右倾错误。

三、恩格斯批判德国“青年派”的启示

在恩格斯的领导和影响下，“青年派”很快被击垮，前后存续时间不到两年。恩格斯对“青年派”的批判成为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成功典范。恩格斯批判德国“青年派”时展现出的对党内思想动态的高度敏感、对舆论阵地的极其重视、对于斗争尺度的准确把握，对我们开展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以下启示。

（一）必须保持对党内外思想动态的政治敏锐性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建设。无论是在19世纪还是在当前，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存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扩散蔓延的条件下发展和活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会以多种方式、利用多种途径影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状态，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和长期性。任何错误思潮的传播都有其内在机制，能否从繁芜丛杂的现象中发现错误思潮的活动、影响，及时予以回应、批判和阻止，直接关系到党的思想建设的有效性，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感”的考验。恩格斯对“青年派”的批判，首先是基于他对“青年派”及其活动的危害保持高度敏感。当1890年春“青年派”局限在学术、文艺领域讨论，并就“五一节”游行展开活动时，恩格斯就产生了警觉，明确批评了其理论观点。1890年7月—8月间，“青年派”在报刊上公开攻击党的领导，恩格斯立即揭露“青年派”的错误及其实质，指导德国党的领导人同“青年派”坚决斗争。1890年9月—10月间，“青年派”在报纸上宣称恩格斯和他们“站在一起”，恩格斯先后发表两篇文章进行驳斥。可以说，恩格斯以特有的政治敏感，及时阻止“青年派”错误思想的蔓延和错误实践活动的扩大，指导德国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消除了“青年派”的影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41页。

当代中国是在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国内存在的非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调整、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等因素，都会影响党内党外的思想状态，使党内出现信仰缺失、精神“缺钙”、个人野心膨胀、僵化保守、精神懈怠等消极状态，民众中出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言论。因此，必须高度关注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态，从是否有利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来分析、认识这些消极思想倾向和消极言论的危害，及时回应各种错误思潮反映出的思想认识问题和社会实践问题，消除思想隐患。

（二）必须使媒体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任何思想思潮都要通过一定的媒介进行传播，舆论阵地的归属直接影响着思想交流交锋的结果。在恩格斯批判“青年派”的斗争中，报刊的控制权是一个重要问题。“青年派”之所以能够掀起一场“大学生骚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掌握了相当数量的党报，拥有《柏林人民论坛》《萨克森工人报》《人民之声报》等舆论阵地。恩格斯在指导工人阶级政党建设过程中，一贯重视党报党刊的建设，提出了党报是无产阶级战斗的“旗帜”、党报是“阵地”、党报党刊是“重要的党内生活杠杆”等重要思想。在批判“青年派”的过程中，恩格斯高度警惕“青年派”控制舆论阵地带来的政治风险，坚决要求党接管“青年派”控制的媒体。而德国党在组织上击败“青年派”的关键一步，就是剥夺他们对报纸刊物的控制权。当然，“青年派”并不愿意交出这个权力，以致在德国党通过工人集会的激烈辩论，作出要求“青年派”将《萨克森工人报》管理权限时交给党，由工人委员会监督其编辑部，保证《人民之声报》编辑部不再进行个人论战的决定后，“青年派”还在编辑部告别辞中攻击党团，伪称有恩格斯的支持，继续在党内制造思想混乱。对此，恩格斯对《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进行公开答复，揭露其谎言。

恩格斯与“青年派”在报刊管理权上的斗争，生动说明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实现党的思想领导，必须高度重视对媒体的控制，让媒体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对此，中国共产党有深刻的认识，并确定了党管媒体原则。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媒体时代，我国媒体呈现官方媒体、社会媒体和自媒体并存的格局，这对贯彻落实党管媒体原则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还要在适应新媒体发展、引领和监管资本媒体上进一步探索、创新。

（三）在思想交锋中坚持原则的同时把握分寸、注重策略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针对一些错误观点和行为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纯洁性的必然要求。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分裂。恩格斯在批判“青年派”过程中非常重视把握分寸、讲究策略。其一，恩格斯将批判的对象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他认为，一些工人支持“青年派”是由于经验不足而易受利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2页。

用，青年知识分子则是受制于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和“学院式教育”，主张把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把工人视为团结对象。其二，恩格斯主张以民主的方式开展批判。他认为，“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对于新党员不能进行“注入式的教育”，“争论、甚至小小的争吵是必要的，这在最初的时候是有益的”^①。对于“青年派”的处理，恩格斯认为不应该粗暴地将他们赶出党外，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成立反对派的谴责”，而在于“有说服力地证明这种行动对党的危害”^②。党同“青年派”的斗争要符合组织程序。其三，恩格斯在批判中注意维护党的团结。恩格斯同施米特所作的沟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施米特同“青年派”中的许多成员私交良好，还一度在“青年派”掌握的报纸中任职。在“青年派”问题暴露之初，恩格斯就密切关注施米特的反应，向他详细说明“青年派”的理论错误，希望“青年派”能够“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③。恩格斯的努力使施米特没有公开站到支持“青年派”的立场上去。1890年哈雷大会后，施米特给恩格斯写信为“青年派”辩护，恩格斯在回信中说明对“青年派”进行理论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必要性。当“青年派”在爱尔福特大会上被挫败并选择退党时，恩格斯又通过施米特对他们进行团结挽救，引导其中一部分人改变思想，重新回到党内。可以说，恩格斯在批判“青年派”过程中展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多种社会思潮围绕“当代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议题，构建理论、引导讨论、争取大众，对党员干部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必须与错误思潮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旗帜鲜明地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保持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上的话语权，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的现实问题，消除错误思潮对人民群众的消极影响。在思想斗争中，应像恩格斯对待“青年派”那样，既坚守底线，不在原则上对任何谬误让步，又发挥党内民主，团结广大党员群众；正确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注意斗争艺术。对于政治原则问题，要依据党纪国法进行处理；对于学术问题，则坚持发扬学术民主，开展平等讨论，以理服人；对于思想认识问题，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加强正面宣传，利用多种传播渠道和方法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化解思想分歧。对于受到错误思潮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青年党员，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和群众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和发展成就，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及人类和平发展作出的伟大贡献。

(杨军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卓然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唐芳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3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33页。

follow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and protect the basic human rights to survival and citizenship , we must thoroughly expose the hypocrisy of the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of American and Western hegemonism in theory and action. China has taken the lead in lifting itself out of absolute poverty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has practiced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concept put forwar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with practical actions. Promo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the guarantee of the legal system ,meeting and realizing the basic needs of the masses and safeguarding human dignity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 should be the basic principles that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hould follow in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 **Issues of Ideology** •

The Root Causes , Lesson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CPSU (Part 1) —Writte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USSR Li Shenming et al. (60)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CPSU ,bu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generation of the leadership group from Khrushchev to Gorbachev is the root cause , which is manifested in eight aspects. In faith , they wavered , deviated from , abandoned and finally completely betrayed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ideals. In theory , they failed to learn , did not understand , deviated from and ultimately diverged from and betrayed Marxism-Leninism. Politically , they weakened , distorted and completely denied and forsook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Marxist-Leninist principles of party development. Economically , they shifted from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public ownership , the better” to the abandonment of the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system , and engaged in promoting complete privatization. Organizationally , they abandoned the party’s nature of being the vanguard of the working class , practiced cronyism and factionalism , and openly usurpe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 terms of work style , they engaged in formalism and bureaucracy , deviated from and betraye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Diplomatically , they initially fear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strove for hegemony , but later catered to and surrendered to Western imperialism hea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outlook on life , they advocated individualism with pursuit of personal promotion and family privileges , and finally became careerists and conspirators who subverted the party and state power.

• **Academic Views** •

Scientific Methods of Engels’s Critique of the “Youth Faction” and Its Implication to Ideological Work

..... Yang Jun and Yang Zhuoran (91)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 Engels’ critique of the “youth faction” in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SPD) i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struggles within the party to guide young people’s ideas.

• 127 •

In critiquing the “youth faction”, Engels used a scientific method, focusing on the root cause and nature of its theoretical errors, analyzing the harm of such errors based on practice, combining theoretical critique with organizational discipline, and eliminating its negative impacts in a timely manner.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Engels’s critique of the “youth faction” is that he combined the critique of erroneous theori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his critique, while emphasizing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as a method rather than a formula, Engels focused on explaining and enrich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at the same time he further clarified the struggle strategies of SPD. Engels’s critique of the “youth faction” teaches us that we must maintain political sensitivity to the ideological trend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PC; we 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party’s management of the media and the control over the front of public opinion; we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and adopt appropriate measures and strategies in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s.

Rosa Luxemburg’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Scientific Socialism Lv Jiayi (101)

The most important and uncontroversial contribution of Rosa Luxemburg’s thoughts is her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scientific socialism, i. e., radical critique of capitalism, defense and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theories, and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socialism. She refuted Bernstein’s fallacies that credit, cartels,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could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and led to successful capitalist reform, and demonstrated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and its replacement by socialism. She defended the r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Marx and Engels, refuted Kautsky’s “fatigue strategy”, and made important development in the theory of mass strikes; she criticized the degeneration of Social-Democracy against internationalism during the war, and shifted from emphasizing the spontaneity of the masses in “self-centralism” to finally moving closer to Lenin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class. High affirmation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her evaluation of it. In addition, she also proposed a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society.

• Academic Forum •

Leaders and Scholars of Marxist Political Parties in Italy and Switzerland Talking about Profound Change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and the Current World Situation—An Excerpt from Speeches by Foreign Participants in “New Era: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Innovation of Marxist Theory in China, Italy and Switzerland”

..... Li Kaixuan and Shi Yue (110)

[责任编辑: 凯 旋]